

文壇趣話三題

● 從維熙

一 「著名作家」求解

「作家」的含意是甚麼？它具有哪些特定的內涵？筆者認為作家的特徵，就是作品。

近兩、三年內文壇怪事不少，最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在去年的一家文化大報上，竟荒唐地將無一篇作品面世的文藝行政官員和經常列席於文學會議的非文藝官員（亦無作品），堂而皇之地列入作家行列不說，還在「作家」之前冠以「著名」二字。這實在是建國以來文壇罕見的奇聞怪事。

何故？

一位評論家詼諧地說：當前召開文學會議，在會上難見作家出席。為了掩飾尷尬的文學局面，把蘿蔔、白菜一鍋燴，顯得體面一些。十幾個人七、八條「槍」，實在太不像樣子；多冠兩、三個「著名」，以壯會議聲勢。此乃分析之一。

另一位作家之分析，似也能成其方圓。他說：人家氣魄大得很，心揣重新締造文藝新軍之宏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順我者『革命』，逆我者『反革命』。」以此門庭之規劃線，自然不必關注其有無作品面世，一律冠

以「著名作家」之桂冠：如篩之過細，不是自喪其志嗎？

第三位憤然而起者，是在文藝機關工作多年的老者。他不平則鳴：這是搞的啥名堂？某某怎麼成「作家」，又平步青雲成了「著名作家」了？我在五七幹校與他「同學」，寫檢查時他把喝牛奶的「喝」字，總寫成「唱」字：「唱牛奶」之典故，成為五七幹校的一大笑料。咋就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他要是著名作家，機關大院連打字員帶汽車司機，就都成了「著著名」作家了？「文革」中也沒有的稀罕事，當今卻有了，這是咋回子事？

鉛印在報紙上的奇聞怪事，不脛而走，一位蟄居在南方邊城的文友，為此給筆者打來長途電話。他先是自慚形穢地說明自己孤陋寡聞，不知文壇又陡然升起兩、三顆新星；然後又誠懇地求我指點迷津，告之新星之處女作以便一睹為快！

筆者愕然，繼而汗顏如洗，久握聽筒難以作答。現筆者將此披露於此，當成科學知識問答書中《十萬個為甚麼》之外的「第十萬零一個」，向作家、編者、讀者求答。如果皆不能回答這「第十萬零一個」，筆者這一紙

文壇軼話只好當成叩問明日文壇的一則「歷史存照」了。

二 「布爾巴」的遺憾

月前，京城某家出版社的文學編輯來家組稿，談及編輯難言之苦衷。他說他因堅持文學的審美標準，退掉了一位「詩人」的詩作而遭到痛罵。不是他缺乏尊敬長者之美德，而是長者缺乏老一代作家如巴金、冰心之風範。

「喂，您是某某某同志嗎？」

「是。我是。」

「您甚麼時候在家，我想去看看您。」

「是不是來送校樣？」

「……」編輯為難了一陣，選擇了中性詞彙回答，「我想跟您聊聊，看您甚麼時候有時間。」

「我忙得很，你有甚麼事情就在電話中說吧！」「詩人」煩躁起來。

「您的詩作，我們拜讀過了。」被逼上「梁山」的編輯，只好直言，「覺得總體印象是概念大於形象，您一定知道，詩是意象奔瀉的結晶體；可是您的詩裏，甚麼『紅旗忽啦啦飄』，甚麼『我們必將贏得最後的微笑』……都不太像詩的語言。」

「你胡說些甚麼？」「詩人」咆哮了，「你作為一個編輯，是否知道現在特別需要捍衛革命勝利果實？你還能算社會主義出版社的編輯嗎？我要問你，你到底姓『資』還是姓『社』？」

編輯啞了。

「我告訴你，我這部詩稿得到過某某同志的讚揚，是經他的手轉交給你們編輯部的。你們要是否定這部詩稿，先去跟某某同志去談。政治抒情

詩嘛，追求的是氣魄，追求的是真理。你懂嗎？」咔嚓一聲，「詩人」放下了電話。

編輯沮喪地將情況向出版社如實匯報，並把詩稿交給主管詩歌出版的負責同志，這位負責同志嘍開了牙花子。之所以如此，這部詩稿確實是一個知名詩人轉交給他的，雖然交稿時留有「以質量取捨」的叮嚀，但畢竟是經過這位詩人之手。於是，他再對這部詩稿進行審讀，但讀來讀去，覺得詩稿是分了行的政治口號，內涵和文學二字無緣。怎麼辦呢？想來想去還只有退稿一條途徑，他把編輯找來，兩人進行了退稿的分工。主管詩歌的負責同志，向轉稿的詩人呈述編輯部的意見，退稿工作由挨了訓的編輯進行。

第二次的電話「交流」之前，編輯已作好挨訓的準備。但未曾料到的是，此「詩人」不再提及詩稿質量，話鋒一轉，罵開了編輯部：「你們是怎麼辦社會主義的出版社的？嗯？你們的大方向對頭嗎？為甚麼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字輩，你們百般寵愛，出書速度和印刷質量又快又好；對我這樣的老字輩，百般挑剔？告訴你們，我的詩稿有地方出，盡快把詩稿給我送回來，缺損一頁我都要找你們算賬。」

編輯講完他們的苦衷，對我傾訴心聲說：「你看，倚老賣老還不算，居然對小字輩出書，流露出百般妒恨的畸形心理。多可怕！」

「一個文品正直的編輯，確實很難當。」

「這正常嗎？」

我對他講了果戈里一部中篇小說的開頭，作為對他的回答：「果氏寫了一部叫《塔拉斯·布爾巴》的小說。小說開頭就是父親和兒子的格鬥較

量。父親的心態是：冀盼兒子能戰勝自己，能超越父輩。果氏這一節展示了作家的博大胸襟，他知道只有一代人比一代人強，俄羅斯才有希望！」

「這位『詩人』的品格，使當父親的『布爾巴』一定感到遺憾了。」這位編輯說道。

我說：「讓『布爾巴』更為遺憾的是，他是果戈里在十九世紀的小說主人公，身分是個魯莽的『哥薩克』，而我們的這位主人公是位『詩人』。」

三 流氓與「流氓文學」

俄羅斯大作家托爾斯泰關於「文學是社會的一面鏡子」之說，上至中國文壇泰斗，下至文學小卒，無不認同。不管你是寫主體感應的「新潮」，還是以客體為主軸的「寫實主義」，從其本質而言，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折射社會感悟人生；因而「鏡子」對文學含義之概括，超越時空而無所不納入其中。

抗日戰爭中有「抗戰文學」，因抗日戰爭中誕生了一批漢奸文人，而必然有「漢奸文學」問世。近日，劉心武的長篇《風過耳》面世，因其小說內容是以近兩年文化界陰暗一隅為背景，觸痛了文壇某些風派人物的靈魂，引起一讀為快之熱潮（見《作家報》韓小蕙寫的〈京城爭讀《風過耳》〉一文），於是便有了「流氓文學」之說。

流氓者，古文中潑皮是也。依此意伸延，文化流氓即文化界中潑皮是也。如果社會確有文化流氓存在，「流氓文學」則會應運而生。問題之癥結，在於儒林是否存在流氓：譬如厚顏無恥地伸手要官，譬如像舊社會黑道幫會那般的在文壇大搞「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文化機構屬於學術性群眾團體，最高權利代表是主席團，但是可以將主席團閑置一旁，幾年不開一次會議，以「一言堂」取代「群言堂」。此外，在鑽營術上則百無禁忌，視真正對中國文學做出貢獻者於不顧，自報「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這真是比吳敬梓筆下《儒林外史》中的芸芸眾儒的形象還要低劣三分。尤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是這樣的文化潑皮，還要侈談捍衛馬列真諦，這不僅是「為人民服務」的偽冒和褻瀆，簡直是一齣齣荒唐絕倫的新儒林之中的潑皮戲劇（為了不有礙讀者的視覺衛生，筆者不想列舉一樁樁一件事實了）。其實，劉心武小說《風過耳》所表現的內容，遠遠沒能寫出新儒林中的斑斑劣漬，只不過在略加點染，畫出幾個狗苟蠅營的小人形象而已，遠遠沒有深入揭示掛羊頭、賣狗肉的文壇醜儒的靈魂。但僅此過耳之清風，就使得其中人驚呼這是「流氓文學」了，豈不令人哭笑不得？！不過這也算歪打正着，反襯着劉心武《風過耳》絕非空穴來風之作。

古人說：己不正焉能正人乎？東晉時期曾有一文官因臉上長了瘡疤而怒摔鏡子之典故。時至二十世紀90年代，文學這面「社會鏡子」，正成為一面具有X光透視功能之時代熒屏，不管癌瘤患者如何頑固地忌諱X光射線之掃描，文學都不可能為此而囁嚅退卻。因此，「流氓」攻訐以揭露抨擊流氓的作品為「流氓文學」，可謂自我曝光的唐吉訶德式之舉。然否？想讀者自有明鑒……

93年3月18日於北京

從維熙 大陸著名作家